

# 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马小能 孙新梅

**【提要】**龚自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其社会改革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事实上，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认为，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有广阔视野，除经史文献资料外，还应从彝器、刻石、碑铭、古印、古镜、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甚至认为诗文中也含有历史记载；龚自珍的小学功底深厚，尤为强调“以字说经”，这是其解读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历史文献的编纂“宜繁不宜简”，历史编纂工作者应努力做到“善入”与“善出”；其在目录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关键词】**龚自珍 文献学 文献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6-0119-05

龚自珍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魏源称其“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匡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sup>①</sup>以往诸多研究，大都集中在对龚自珍经学观点、经学流派的探讨，或是对其社会革新、批判思想的阐释，或是对其诗歌、散文等文学成就进行历史评价等，而较少涉及其历史文献学思想方面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就此展开系统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 一、“规矧六籍，笼罩百家” ——历史文献的搜集

龚自珍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是十分广阔的，房考称其为学“规矧六籍，笼罩百家。”阮元则称“其为学，靡书不览。”<sup>②</sup>具体而言，除重视经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外，龚自珍还提倡从彝器、刻石、碑铭、古印、古镜、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并指出，诗文亦可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就经史文献资料而言，龚自珍认为，“六经”和“诸子”都可作为研究先王时期历史的重要依据，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六经是“大宗”，诸子是“小宗”而已。他甚至还指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作为后人研究

当时历史的重要依据，这就大大拓展了人们搜集历史文献资料的视野。<sup>③</sup>我们仅从其对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即可见一斑。<sup>④</sup>龚自珍十分重视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据年谱所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和道光二年(1822)的两次大火，将先前所收聚之档册图志，全部焚毁。为了完成正在进行的《蒙古图志》的编纂工作，于是龚自珍“就藏书故家，求顺治前辈文章，钩索旧闻，又获窥累朝朱签及丝纶簿，”以一代文献自任。他所辑的这些资料有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皆史家底本也。”<sup>⑤</sup>在他看来，“能见档册，能考档册，能钩稽补缀”乃“福甚大”之一事，“无有伦比者也。”<sup>⑥</sup>

除重视经史文献资料外，龚自珍还极力提倡从刻石、彝器、古印、碑铭、瓦文、古镜等实物中搜集资

① 《定庵文录叙》，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0~651页。

②⑤ 《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02、603页。

③ 何根海、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

④ 覃兆别：《浅谈龚自珍对档案的重视》，《浙江档案》1999年第9期。

⑥ 《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龚自珍全集》，第305页。

料,并对这类器物文字的史料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时人称其金石之学,“精博绝特”,“时出新解。”<sup>①</sup>在他看来,商周彝器所载,“凡古文,可以补今许慎书之阙;其韵,可以补《雅》《颂》之隙;其事,可以补《春秋》之隙;其礼,可以补逸《礼》;其官位氏族,可以补《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三代以上,无文章之士,而有群史之官。群史之官之职,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抵为有土之孝孙,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为文章家祖。”<sup>②</sup>是不可小觑的。龚自珍还指出,墓碑与古印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因为墓碑所刻文字,“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别子也。”<sup>③</sup>就古印而言,则可补史之缺。“第其钮,别其金三品,则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见于史,是亦补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则思古人之深情也”。<sup>④</sup>而就古镜和瓦当而言,分别是古代生活日用品和建筑用品,但因其中有不少刻有铭文,亦不可小觑。如古镜所载四言文字,“在《易》‘繇’与《诗》之间”,所载三言至七言文字,“在谣谚之间”,“体裁尤芳异,文章家喜之,录之以贶夫言诗者也。其用韵,则不可以周之谐声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与隶书相杂为体”。<sup>⑤</sup>又如西汉之瓦当,“乃兼大小篆”,可以“识炎运之西隆,窥刘祚之东替也矣。”<sup>⑥</sup>

龚自珍还特别指出,诗文中亦含有历史记载。在他看来,选诗“皆天下文献之宗子所有事也。”<sup>⑦</sup>其在论《白石山馆诗》“晚来风更好,无奈船舶时”时则指出,“结语中有史事”。<sup>⑧</sup>在《乙丙之际箴议第十七》中则指出:“诗人之指,有譬献曲之意,本群史之支流。”<sup>⑨</sup>龚自珍的这一治学观念为后人所继承。“以诗证史”已成为现代史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方法。

## 二、“以字说经”——历史文献的解读

“以字说经”,即是根据文字的形、声、义来训解经典文献,这是龚自珍极为重视的解经方法。<sup>⑩</sup>龚自珍的少年时代,主要受到的是汉学教育。据《年谱》所载,“龚氏世有隐德,匏伯先生以科目起家,簪纓文史,称浙右族。”其外王父段玉裁是皖派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入室弟子,深于文字音韵之学。其父龚丽正“从茂堂先生受小学训诂,以经学课子弟”,<sup>⑪</sup>并有《国语补注》、《楚辞名物考》等著述留世。母亲段训亦工书法能诗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皖学后进王引之又是龚自珍乡试的座主。这就使得龚自珍自幼即受到严格的文字学和考证学训练。8岁时,得旧《登科录》读之,此

为搜辑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12岁时,段玉裁授其以《许氏说文部目》,为“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14岁时,考古今官制,后成《汉官损益》、《百王易从论》;16岁时,始读《四库全书提要》,为目录之学,“自是蓄书颇富,多七阁未收之本”;17岁时,游太学,见石鼓文,非常喜好,开始研究金石学;21岁时,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之校录,遂为校讎掌故之学。23岁时,为修《徽州府志》,“甄综人物,搜辑掌故。”<sup>⑫</sup>正如吴昌绶先生所言,“先生之学,有自来矣。”<sup>⑬</sup>

在他看来,小学是经籍之“户枢”,<sup>⑭</sup>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之效用,<sup>⑮</sup>“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sup>⑯</sup>小学是求得史实真相的入手处。在肯定考据学的基础上,龚自珍还提出了整理考订文献资料的方法。他认为,文献资料的整理考订,应坚持“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sup>⑰</sup>的原则,以便从中得到事实真相。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龚自珍12岁时,外王父即授其以《许氏说文部目》,此即为“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这一原则为龚自珍一生所遵循。“夫解经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经也。韩氏曰:读书略识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称经生者也。诸生治经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纵言之。”<sup>⑱</sup>尽管龚自珍将“解经莫如字”与“解字莫如经”相提并论,但他更强调“以字说经”,认为不明字,则不足以称之为经生者也。<sup>⑲</sup>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汉字,都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同文有三训:一形,二声,三义。形,谓古文变而为大篆,即籀文,东周时所用,观周铜器与商器迥殊自知。义者,周公作《释诂》,故孔子告哀公:《尔雅》以观于故,足以辨言

①⑩⑫⑬ 《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12、592、593~598、592页。

② 《商周彝器文录序》,《龚自珍全集》,第267页。

③ 《说碑》,《龚自珍全集》,第265页。

④ 《说印》,《龚自珍全集》,第267页。

⑤ 《镜录序》,《龚自珍全集》,第283页。

⑥ 《瓦录序》,《龚自珍全集》,第284页。

⑦ 《张南山国朝诗征序》,《龚自珍全集》,第206页。

⑧ 《语录》,《龚自珍全集》,第436页。

⑨ 《龚自珍全集》,第9页。

⑩ 黄开国:《龚自珍的以字解经》,《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⑪ 《六经正名》,《龚自珍全集》,第37页。

⑫ 《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第193页。

⑬ 《抱小》,《龚自珍全集》,第93页。

⑭ 《六经正名答问五》,《龚自珍全集》,第40页。

⑮ 《家塾策问一》,《龚自珍全集》,第121页。

⑯ 黄开国:《龚自珍的以字解经》,《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矣。声，谓谐声，马季长训子所雅言，以为于《诗》、《书》、《礼》，皆正其声音，试观十五国风，用韵部居同，不啻后世之有诗韵。是形同义同声同而总谓之书同文。三者具而一文完。”<sup>①</sup> 这里，我们不必斤斤计较龚自珍以形、声、义来解释“书同文”的合理与否，其对文字的见解却是十分明确的，即每一个汉字都是有形、声、义三部分组成的，而文字的形、声、义正是训解经典必不可少的一步。基于这一认识，龚自珍曾将见于历代的小学类书籍，按形、声、义的不同，划分为三大类：“《说文》，形书也，顾一字有一字之形，与一字之音与义，而后一篆完。故说者曰：《尔雅》、《广雅》，义书也；《声类》，音书也；然则歧而为三；抑治《说文》而经纬备举也？”<sup>②</sup> 在这三大类书籍中，龚自珍尤为推重《说文》，称“治《说文》而经纬备举。”这是因为《说文》中每一个完整的篆文，不仅有形，且声、义兼备。

龚自珍还继承了清初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sup>③</sup> 的治学方法，较为注重音韵训诂的作用，指出声韵是小学之“枢纽”，<sup>④</sup> 在他看来，语言有古今之异，有地域之异，“古之世，语言出于一，以古语古，犹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以后语古，犹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sup>⑤</sup> 只有了解古音才能读懂古语，否则只能误读。“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sup>⑥</sup> 皮锡瑞先生曾就此评曰：“龚氏通翻译，解读字尤确，据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未异之故。”<sup>⑦</sup> 龚还强调指出，声之中有大韵、今韵、等韵三门，尤其等韵是明了天下汉语的关键。“六书为小学之一门，声又为六书之一门，等韵之学，又为声中之一门；然则谈古韵者，胡为而不屑谈等韵也？抑治经未暇欤？意者谓古韵足裨经读，而等韵为余事；不知古韵明而经明，其体尊；等韵明而天下之言语明。语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贯之欤？”<sup>⑧</sup>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明确指出，等韵既是研究音韵学的难点，又是核心与关键。<sup>⑨</sup> 而嘉道时期的龚自珍已对等韵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肯定，足见其考据功力之深厚。

需要说明的是，龚自珍虽不否认文献工作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但他对斤斤于“琐碎恒订”式的考据之学，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尖锐地指出烦琐考据的严重弊病，“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sup>⑩</sup> 并将空谈性理与沉醉于细小问题考证二者的弱点归结为：“彼陟颠而弃本，此循本而忘颠。”<sup>⑪</sup> 他在给魏源的信中则指出，做学问要“能言其大本大

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氏之所谭，而知其义例，徧入其门径，我从而芟芻之，百物为我隶用。”<sup>⑫</sup> 恳切规劝魏源不要被烦琐的考据所牵累，要做个能综合众说、掌握关键、为我所用的“通人”。

### 三、“宜繁不宜简”——历史文献的纂修

“宜繁不宜简”，是龚自珍关于历史文献编纂的重要原则。有关这一问题，见仁见智。唐代学者刘知几曾指出，“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的弊病多失诸烦累，主张“省句”、“省字”。<sup>⑬</sup> 龚自珍则指出，历史文献的编纂“宜繁不宜简”，应尽可能地更多的文献资料留传给后人。这一原则是在《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一文中提出的。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龚自珍的父亲在徽州府走马上任，龚自珍随父侍任。在徽州的这四年时间，他参加了由其父主持的徽州府志的编纂工作，并写下《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一文，阐述了其对纂修府志的一些意见和见解。在他看来，“府志非史也，尚不得比省志。今法，国史取《大清一统志》，《一统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为底本，以储它日之史。君子卑逊之道，直而勿有之义，宜繁不宜简。设等而下之，作县志必更繁于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没忠清文学幽贞郁烈之士女，以自试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学苟夫，为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惧矣。”<sup>⑭</sup>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府志与省志不同，不属于史之范围；二，府志虽非史，但因是省志、《一统志》甚或国史之底本，所以府志的编纂应“宜繁不宜简”；三，府志编纂“宜繁不宜简”的重要目

① 《语录》，《龚自珍全集》，第422页。

② 《家塾策问一》，《龚自珍全集》，第120页。

③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

④ 《蒙古声类表序》，《龚自珍全集》，第221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三》，《龚自珍全集》，第15页。

⑥ 《大誓答问第二十四》，《龚自珍全集》，第75页。

⑦ 皮锡瑞：《经学通论·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页。

⑧ 《家塾策问一》，《龚自珍全集》，第121页。

⑨ 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 《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第347页。

⑪ 《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第195页。

⑫ 《与人笺一》，《龚自珍全集》，第337页。

⑬ 刘知几：《史通》卷6《叙事》，浦起龙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⑭ 《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龚自珍全集》，第334页。

的,即是要使“忠清文学幽贞郁烈之士女”之事迹不至于被翦除埋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献的编纂就应“宜繁不宜简”。龚自珍提出的这一原则深得当时编纂人士的赞赏。徽州名士汪龙称赞其不仅见识卓越,且系文献之望,自己佩服之至,甘拜下风。

龚自珍还指出,文籍丰富是“太平文致”、社会文明的重要的标志,他说:“掌故不备,则无以储后史,无以储后史,则太平不文致,重负斯时。”<sup>①</sup>其对“史之亡”多有感慨。“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献杞不足征’。伤夏史之亡也。殷之亡也,曰:‘文献宋不足征’。伤殷史之亡也。周之东也,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sup>②</sup>文献不足征,后人也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和认识以往历史。因而,历史文籍能否完整地保留下来,是同国家兴衰,纪纲毁立、人才通塞、宗法继承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不应删繁就简。他还公开反对“尚简”之法。“自上国文籍,至于九州岛四荒,深海穹峪,燹臣蛮妾,皆代为搜辑而后已,而不忍以简之说进,今事无足疑也。”<sup>③</sup>前人尚能将“九州岛四荒,深海穹峪,燹臣蛮妾”等,一一载入文籍,不忍就简之说,我们今人“宜繁不宜简”,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龚自珍还对《一统志》过“削”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据史料记载,科布多为七部。七部中,不与商民通市者二部;与商民交易者五部。然仅惟礼哈沁部见于表传,其余六部无闻。他指出,表传为纪功绩而作,无功者不书,六部无闻还有情有可原。而《一统志》地书也,“焉得而削之”,<sup>④</sup>这一批评无疑是龚自珍“宜繁不宜简”原则的一个侧面反映。

龚自珍还对“好聚图籍”者多有推崇。康熙年间,徐乾学主修《一统志》,光史上、节妇之名就多至十余卷,门下士请求核减,其正色道:“国朝风教迈前古,宜备载其盛,矜后世也。”不得削减。龚自珍对这一“备载详录”的主张是十分赞同的。称曰:“是公之所见者甚大,抑其词令,可谓有文者矣。”并指出,好的文籍应“毋吝为博,多以贻之,以厌足之。”既然史籍的储备“宜繁不宜简”,那就应不厌其烦地下足功夫,以便获得真实的文献材料。龚自珍还借许慎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于古字,今事曠于古事,是故今史繁于古史”,这是“古今之大势”。左丘明之《左氏春秋》,“其事如蚁”,而“圣门之徒,无讥其繁者”。<sup>⑤</sup>为了使自已负责纂修的“甄综人物,搜辑掌故”部分达到资料翔实的效果,可谓是“小小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sup>⑥</sup>其内容范围之广阔,探讨之精深,为当时人所罕见。朱杰勤先生曾断言:“求清代掌故者,必于龚氏之门也。”<sup>⑦</sup>

我们说,龚自珍的“宜繁不宜简”论,从保存史料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是毫无选择地、大量地一并重复收录,则又有失偏颇,徒加后人研

究的困难。这是因为,“为文纪事,主于辞达,繁简非所计也。”<sup>⑧</sup>对此,顾炎武、钱大昕均有精辟论述。顾曰:“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sup>⑨</sup>钱称:“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sup>⑩</sup>也就是说,不论繁简,需要表述的东西完整无缺地表述出来了,多则不多,少则不少。因而,我们还是比较赞同白寿彝先生对文字繁简问题的看法。他说:“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sup>⑪</sup>该繁则繁,该简则简,不能与繁就简,或与简就繁。

#### 四、“善入”、“善出”——历史文献工作者的修养

龚自珍对历史文献工作者的修养问题也提出了直接要求,在他看来,要真实地记载历史,首先就应做到“善入”和“善出”。所谓“善入”,即要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也就是说,只有熟练掌握天下的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地情况、世家大姓、国家政令、吏胥职守、礼兵政狱、掌故文献、历史人物等,并深入进去,如同言及自家事一样,才能用“实录”的方式进行历史记载。

何谓“善出”?其释曰:“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钙睐而指点焉,可谓

① 《国朝春曹题名记序》,《龚自珍全集》,第190页。

② 《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第22页。

③⑤ 《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龚自珍全集》,第334~335、334~335页。

④ 《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龚自珍全集》,第314页。

⑥ 《江左小辨序》,《龚自珍全集》,第200页。

⑦ 朱杰勤:《龚定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1年(1972)版,第53页。

⑧ 赵与时:《宾退录》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⑨ 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章繁简》,陈垣校注本,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3页。

⑩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528页。

⑪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5页。

出矣。”也就是说，历史文献工作者，要能针对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地状况、大的姓氏家族、国家法令、礼兵政刑、掌故问题、人物臧否等“号咷舞歌，哀乐万千”的复杂状况，进行合理地判断，品评其优劣，发表其“高情至论”，如同“堂上观者，肃然踞坐，钙睐而指点矣。”不“善出”者，必不会有“高情至论”，所言“必有余喘”，<sup>①</sup>自然也就无法得出公正的评论。

从龚自珍的“善入”、“善出”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事历史研究，不仅要能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之真实，还要能客观地评论史事。否则，就是“余吃”、“余喘”，白日说梦。就两者关系而言，“善入”是“善出”的前提，要“善出”，必须要做到“善入”。而要做到“善入”，就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龚自珍曾明确指出：“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sup>②</sup>

龚自珍还强调指出，当今之世，急需一批有“胸肝”，有“耳目”，有“上下百年之见闻”，能“考订同异”，<sup>③</sup>“心术不欺，言语不伪”的人才。<sup>④</sup>要能“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贻，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sup>⑤</sup>即一个称职的历史工作者，不仅要有熟悉掌故，善于记事之才能，还应具备不吝私情、坚持操守之品德。而他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曾指出《清一统志》重修中的“循袭而不改，阙略而不补，颠舛而不问，苟简而不具，弃置而不道，迴护而不变”<sup>⑥</sup>等十几个方面的不妥，但由于书中言辞多有不逊，得罪当道者，被迫离京。

除此之外，龚自珍对目录学也有独到见解。他说：“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勖《中经簿》，宋《崇文总目》、《馆阁书目》类是也；一曰私家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类是也；一曰史家著录，则《班史·艺文志》、《隋书·经

籍志》以下是也。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故不能偏废。三者之中，体例又二：史家著录，惟载卷数；其它一则载卷数，一则条书旨。其最详者，则又加注某抄本、某槧本，旁及行款印记题跋。兹事虽细，抑专家之业至于是而始可谓备，则亦未易言矣。”<sup>⑦</sup>龚自珍的“朝廷官簿”、“私家著录”、“史家著录”三分法基本上涵盖了其前的目录学著作，且对其体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他反对脱离现实的繁琐考证，但并不否认文献工作中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晚年的龚自珍十分懊悔当年朴学功夫没有学到家，所以寄希望于儿子用功读书。诗曰：“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嚼九流。”又曰：“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氍载一车”。<sup>⑧</sup>他还指出，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广泛进行，并主张用事实求是的态度，运用各种方法，以获得历史真相。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值得进一步发扬。

本文作者：马小能是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2011 届博士；孙新梅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尊史》，《龚自珍全集》，第 80~81 页。

② 《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第 346~347 页。

③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 319 页。

④ 《述思古子议》，《龚自珍全集》，第 123~124 页。

⑤ 《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第 28 页。

⑥ 《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龚自珍全集》，第 318 页。

⑦ 《慈云楼藏书志序》，《龚自珍全集》，第 203 页。

⑧ 《乙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 537 页。

## Gong Zizhen's Thoughts on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Mao Xiaoneng Sun Xinmei

**Abstract:** Gong Zizhen was a well-known thinker, writer and poet during Qing dynasty, and his social reform and critical spirit was discussed by later scholars. In fact, His thoughts on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were very rich.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y documentation must have a broad horizon. In addition to classic documenta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ditando, petroglyph, inscriptions, ancient seal, mirror, bricks etc, even the poems; Gong Zizhen emphasized that the classic documenta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words, which w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reading history;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uld be complicated, rather than be abridged, and the worker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uld be good at going in and out; Gong Zizhen also had an unique perspective in bibliography.

**Key words:** Gong Zizhen; documentation; the thoughts on documentation